

南社人的“革命”話語

張春田

提 要：南社人對改造中國的夢想，集中凝定為對“革命”的追求，尤其表現為他們在“革命”輿論的塑造和鼓吹上。考察他們對於“革命”一詞的使用，可幫助我們了解“革命”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多重意義糾纏與裂變，理解知識人在中國近代轉型中的特殊心路。

關鍵詞：南社；革命；話語；正當性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活躍在清末民初的南社人，大多是詩酒風流的舊派文人。但南社人在轉折年代卻也是以筆為劍，呼喚風雷的革命志士。他們對中國改造的夢想，集中凝定為對於“革命”的追求，尤其表現於他們在“革命”輿論的塑造和鼓吹上。他們對革命的論述並不局限於頻繁地使用“革命”一詞，甚至在“革命”這個詞的跨語際翻譯中他們也並沒有扮演顯赫的角色^①。然而，南社人對於“革命”一詞的使用，還是深刻地呈現了“革命”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多重意義糾纏與裂變。“革命”作為一個“衍指符號”（the super-sign）^②，在歷史洪流中攜帶了豐富的政治所指與想像。

—

南社人最早使用“革命”一詞，大概是柳亞子於1902年冬所作〈歲暮抒懷〉的第二首：“思想界中初革命，欲憑文字播風潮。共和民政標新諦，專

① 關於“革命”話語的翻譯過程，參見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182。

② 劉禾著，楊立華譯，《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9），1-37。

制君威掃舊驕。誤國千年仇呂政，傳薪一脈拜盧梭。寒宵欲睡不曾睡，起看吳兒百煉刀。”^③這首詩中出現了幾個表明新的政治價值的辭彙，如“革命”、“共和”、“民政”等。柳亞子顯然多少已經接受到盧梭的學說，並且因此在思想上受到很多啟發。他這裏講的“革命”限定在“思想界”領域，更多還是意味一種變革，跟梁啟超所謂“詩界革命”、“文界革命”中強調詩歌和文章的質變用法近似。這樣使用革命，顯然已經超出了中國傳統“革命”話語中關於“湯武革命”的改朝換代的意涵。柳亞子吸收了思想界中對中國傳統革命意義的改造，加入了創立共和、反抗專制的內涵，但字裏行間也傳達出他自己對於“革命”的一些潛意識。第一，這種變革不是漸進的，而將帶來一種根本的斷裂。同時，需要主動的人力去推動這種變革，傳播風潮^④。所以，革命既是徹底的，又是線性歷史觀下的人為選擇。第二，他意識到“文字”（也就是語言和敘述）在傳遞這種革命意識的過程中，將能發揮強大的功能。換言之，他對於“想像的共同體”的塑造機制已有認識^⑤。通過文字調動社會力量和文化資源，這成為他以及其他中國知識人新的自我使命。而傳遞“革命”新知又涉及到現代大眾傳媒與印刷資本主義的運作，“播風潮”的“播”體現出對推波助瀾的“傳播”機制的意識，而“風潮”則暗示大眾的潛在力量成為知識人腦海中考慮的要點。第三，儘管柳亞子首先著眼於“文字”，但在内心深處也依然為“革命”的暴力色彩所蠱惑。在文字風潮之外，他更對通過暴力改變現實政治充滿渴望。“起看吳兒百煉刀”就表明他沒有排除暴力手段成為一個選項，相反，卻將傳統革命文化符碼裏的暴力顛覆意涵作為思想“革命”的自然延伸。

柳亞子對於革命的迷戀，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章太炎、吳稚暉等人的影

③ 亞盧（柳亞子），〈歲暮抒懷〉，《江蘇》8（1903）。

④ 對人力的強調，通過“革命”來改變自然“天演”中的劣勢，成為清末“革命”敘述中的一種傾向。1904年，孫中山在批評保皇黨人的漸進論時，說：“我們中國先是誤於說我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於今也都曉得不能用，定要取法於人。若此時不取法他現世最文明的，還取法他那文明過渡時代以前的嗎？我們決不要隨天演的變更，定要為人情的變更，其進步方速。兄弟願諸君救中國，要從高尚的下手，萬莫取法乎中，以貽我四萬萬同胞子孫後禍。”〈在東京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的演說〉，收《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一冊，281-282。

⑤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1), 1-7.

響。因為他這一階段正在愛國學社學習，同時又與鄒容等過從甚密。他參與撰寫了以章太炎之名發表的〈駁革命駁議〉，駁斥康有為等改良派的主張。柳亞子自己寫的一段是關於菲律賓獨立的：

《新聞報》主筆說，二十世紀，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時候菲律賓大總統阿圭拿度將軍剛剛失敗，他就拿來做一個例子。而我的駁論是，失敗者成功之母，菲律賓雖然失敗，將來一定會成功的^⑥。

把菲律賓的革命作為榜樣，這顯示了他同時有著開闊的世界主義的視野，以及在現代世界革命浪潮的刺激下的狂熱。

二

1903年隨著鄒容的《革命軍》、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的出版，中國現代革命意識“趨向成熟”，有研究者將之稱為“革命初潮”^⑦。就在這一年6月，陳去病在《江蘇》上發表了〈革命其可免乎〉。這篇長文開宗明義即強調“革命”的勢在必行：“嗚呼，革命豈可免乎！”陳去病以歷史和現實的分析，去論證革命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文章從當時最引人關注的東三省的危機談起，把滿清統治者稱為“淫昏之老婢，選喪之攝政，刑腐之餘生，驕惰之孽裔”，指責他們賣國求榮：

既浸被蠱惑，醉心耽溺，欲北向長跪，謹手捧我營州之故壤，全遼之版圖，再拜再皈首，以進獻於尼哥拉士第二之陛下，而歸其統轄。我黃胤不忍神州之陸陷，深懼大陸之割割，奮然思起而爭之^⑧。

陳去病指出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留日學生才組織學生軍，開展拒俄運動。他們闡述自己的宗旨：“一則曰拒俄，再則曰屬在政府統制之下，情詞卑遜，志氣委局，屏息乞憐，至可憫念。”陳去病在修辭上下了很大功夫，他故意蕩開一筆，交代“四海豪傑之士”對留學生宗旨的兩點質疑：一是繼續依靠政府，“不足當環球起義英雄之一盼，更何可冀法朗西之興革命軍，

^⑥ 柳亞子，〈我和言論界的因緣〉，原刊《逸經》第一期，轉引自楊天石、王學莊，《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9-10。

^⑦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17-18。

^⑧ 季子（陳去病），〈革命其可免乎〉，原刊《江蘇》第四期，收張夷編，《陳去病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二冊，388-389。

華盛頓之豎獨立旗而欲竊掠微些之名譽乎？”二是放棄了民族主義的追求：“然則其平時所謂民族主義，於此蓋尤煙銷熏歇，而絕無有斯須之影響。”引入這樣的批評聲音，主要是為了造成反襯，與後文關於清政府回應方式的描述構成對比。即使留學生如此謹慎，寄希望於體制內解決，但清廷卻將他們“斥為黨徒，目為悖逆，指為不軌，怒為對敵”。“聞其密劄有曰：‘名為拒俄，實為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藉拒俄之詞為？今既拒俄，則非革命，固無疑矣。……夫有拒俄之誠，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於滿洲者懼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圖拒俄之計，吾轉不知彼滿洲者於我將奈之何。”總之，正是因為清政府的錯誤處理，把本來可以依靠的力量變成了自己的敵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是被清政府逼迫出來的。到這裏，以“嗚呼，革命其可免乎”終結這一段討論，顯得水到渠成^⑨。

接下來，陳去病在寫法上借鑒了中國傳統散文中主客論辯的模式，安排一個“客”的聲音，以袁世凱為例，論述即使“我漢種中之為滿奴者”尙且遭到猜忌，更不用說對留學生的壓制了。又以張之洞為例，即使對清廷極為忠誠，也因主張拒俄而被排擠。清廷抱著“俄滿一家”、“俄即滿洲理無可拒”的態度，已經表明了它對殖民性的根本認同，更暴露了它本身對中國的統治就是一種殖民邏輯。因此，反抗殖民，被清政府認為就是反抗其統治。這顯然進一步揭示了全球殖民力量的勾結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同時，對那些對清廷還有幻想的漢族官員，也是一種拉攏。陳提出了以民族主義對抗殖民主義的緊迫性：

當此之時，我皇帝子孫，以有至極患懼之禍，而又蒙莫須有事之名，就情勢論之，蓋幾乎革命亦革命，非革命亦革命矣，而況乎來日之方長也。迫乎哉！革命其可免乎^⑩！

以民族主義作為“革命”的正當性來源，還體現在下面兩段討論中。在談到粵西漢人起義之事時，陳去病指出滿清利用漢人制衡漢人的策略。對漢族與對外國列強的態度構成了對比：“彼膾族之待我黃胤，其刻毒殘忍，何

^⑨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389。

^⑩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391。

竟若是之烈哉？而其媚外政策，顧又若彼。惑乎哉！革命其可免乎！”^①而在對時局的分析中，陳同樣體現出對現代視野中的政治洞察力。他提出滿清出於捍衛專制統治的考慮，“悉移其歐美各邦之國際，專意以傾向於俄”。所以，當滿清把留學生的“拒俄”行為定位為“革命”時，其實準確地把握到了“革命”所包含的民主共和許諾。而陳去病把“革命”的正當性也建立在世界性的民主潮流之上：

至若君非固有之君，臣無可摘之罪，投袂興起，大義宣昭，此固環球各邦所當聞而起敬。……鑒夷狄之有君，羞哉諸夏，眷波蘭之無國，痛矣為奴。周文公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念之哉！革命其可免乎^②！

這段話裏新舊資源混融在一起。一方面以“環球各邦”的支持來表明“革命”是一種難以抗拒的世界性潮流，以波蘭等國的滅亡來揭示“不革命”的教訓，顯示出進化論的、世界性的視野。但另一方面，又繼續沿用了儒家傳統中關於君臣、夷狄的規範性論述，把恢復天意民心作為“革命”的一種道德基礎，特別是關於“吾皇祖在天之靈，以迨成湯、周武、漢高、明太諸仁聖先帝”會指揮神兵、暗中支持的說法，更有些小說家言的味道。“革命”的現代與傳統意涵之間不無張力，但這種混沌卻真實地表徵了當時知識人特定的精神世界與知識構成。

“革命其可免乎”在文章每一段結尾都重複了一遍，顯然富有煽動性，在讀者閱讀心理上造成了一種革命迫在眉睫的效果。陳去病號召人們不要對未來感到灰心，而要切實地行動起來，成為革命中的一員：“革命乎，革命乎！其諸海內外英才傑士，有輟耕隴畔而撫然太息者乎？則予將伏劍從之矣。”

在全文後面還附有一首“歌曰”，這顯然是對古典歌行體的一種有意規模。這首“革命之歌”其文甚長，大致是呼籲“吾黃胤”“急起以自圖”。值得注意的是，陳去病同樣在世界歷史的觀照中，揭示面對殖民危機，中國選擇“革命”的必然性：

^①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391-392。

^②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393。

夫歐美之激昂兮，多敕人以驕瞿。意收功於三傑兮，法終斥其獨夫。美離英而自由兮，猶決戰於販奴。此固彰彰印心腦兮，況如南斐、呂宋屢麾獨立之發弧。翳蟬臂且尚然兮，寧吾擁有七億方裏之輿圖，聚有四億兆民之頭顱，乃獨不能脫羈絛于羯胡？嗚呼噫嘻，迨今不革命兮，後雖噬臍顧何及乎^⑬？

陳去病將全球空間的不均衡性呈現了出來。他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不同路徑的崛起，無論是統一國家（如義大利），推翻王權（如法國），還是捍衛自由（如美國），都作為“革命”的結果。這樣就把“革命”變成了一個包容性的範疇，代表著進步的歷史潮流。而南非、菲律賓的“革命”，更提供了弱小國家如何通過抗爭，尋求獨立的經驗。在全球語境下，“革命”對於中國的最大意義就是創造獨立主權國家。陳去病在結尾說道：“必獨立以自治，勿依賴而躊躇。”如果聯繫到前文關於南社人如何在“排滿”上寄寓了新的國家建構的理想，那我們可以說，南社人在“革命”上同樣表明了把國家作為抵抗性的集體力量，而非壓抑性的國家機器的政治態度。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陳去病並沒有因為捍衛“革命”的正當性，就把一切對於清政府的叛逆事件都視為“革命”。1908年廣西發生兵變，嘩潰的軍人搶劫商家財產，威脅地方秩序。當時在汕頭《中華新報》主筆政的陳去病，發表〈論粵西兵變〉，將叛亂視為國家的威脅，提出應付策略。第一條就是“務令叛軍勿與會黨相聯，則智謀缺乏，運籌無人，日久不支，自可殄滅”^⑭。當時革命黨跟會黨聯絡密切，很多起義都利用了會黨力量，而且很多革命黨人本身就加入了會黨。按說不遺餘力呼喚反清的陳去病，應該支持會黨，即使在公開的報刊上不便直言，也不必要獻策防範會黨。但這篇評論，卻顯出他在具體事件上試圖站在普通民眾立場上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在他看來，粵西剛遭災荒，又出現兵變，對於地方安寧和民眾生活都造

^⑬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394。

^⑭ 陳去病，〈論粵西兵變〉，《陳去病全集》第二冊，462。

成破壞影響。他似乎並不相信流民和會黨力量可以創造出積極的“革命”^⑯。

三

柳亞子同樣高揚“革命”作為變革的主題。1904年2月他在〈除夕雜感〉組詩中提到“革命”：“幽幽慘慘同文獄，烈烈轟轟革命軍。警電急傳鈞黨禍，橫刀裂背望燕雲。”^⑰一方面認為清政府針對鄒容《革命軍》的處罰是在重興文字獄和黨禍；但另一方面卻又承認《革命軍》有轟轟烈烈的影響，並且實實在在地影響到他自己，促使其政治態度進一步地激烈化。這一年他發表〈中國革命家第一人陳涉傳緒論〉，也是從“革命”在歐洲現代歷史上的重要意義談起：

吾見夫西歐大陸，自十八世紀下半期之前，以至十九世紀上半期之後，其間若政治、法律、學術、風俗，種種有名無名之事物，莫不劃然分一大鴻溝。……噫！此何事，此何事？則十九世紀茫茫歐海掀天揭地之革命軍為之原動力也^⑱。

在柳亞子看來，正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為歐洲政治和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推動社會的飛速進步上，革命實在功不可沒。柳亞子甚至把革命推崇為一種不可或缺的現代道德乃至生活形式本身：

夫革命二字，實世界上最爽快、最雄壯、最激烈、最名譽之一名詞也，實天經地義、國民所一日不可無之道德也，實布帛菽麥、人類所一日不可缺之生活也^⑲。

對歐洲革命的推崇，使他反過來對照中國歷史，希望在中國歷史上發掘“革命”的傳統。他得出的結論不無矛盾：

^⑯ 清末革命黨的多次起義，都是聯絡會黨而進行的。但有意思的是，1919年孫中山特意告誡當時負責國史編纂的蔡元培，秘密會黨史實“不可混入民國史中”，因為它們“內部組織仍為專制，階級甚嚴，於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增刊第一輯·孫中山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76），168。

^⑰ 柳亞子，〈除夕雜感〉，收《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上海南人民出版社，1985），19。

^⑱ 亞盧，〈中國革命家第一人陳涉傳緒論〉，《江蘇》9-10合本（1904）。

^⑲ 亞盧，〈中國革命家第一人陳涉傳緒論〉，《江蘇》9-10合本。

謂中國無革命乎？吾見夫嬴顛劉蹶，甲攘乙奪，赤縣神明之士，莽然不一姓，而鼎革二字，無三百年不出現於史冊也。謂中國有革命乎？則彼盜賊紛擾，權奸恣睢，以欺人孤寡，夷人宗祀，要為無意識、無道德之破壞。而犬羊戎狄之長，帝制自為，狎中夏而主齊盟者，更無足以污蔑革命之資格也^⑯。

柳亞子認為，就傳統的改朝換代意義上的“鼎革”而言，中國歷史上不斷在發生，但是這是否都能算作“革命”呢？如果只是為了私利，肆意使用暴力，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那只是“破壞”，算不上“革命”。如果是異族入侵導致的政權更替，那更談不上“革命”。在他心中，“革命”代表著進步和正義，其神聖性不是歷史上那些暴力政治事件所能玷污的。顯然，這更多是一種斷言，而非論證。

在柳亞子這篇文章發表之前不久，梁啟超發表了〈釋革〉，詳加區分了 Reform 和 Revolution 之不同的“革”：“Reform 者，因其所固有而損益之以遷於善，如英國國會一千三十二年之 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譯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 者，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如法國一千七百八十九之 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譯之曰革命。”^⑰儘管梁啟超自己更欣賞英國式的改良革新，但他同時認為，中國積弊太深，暮氣沉沉，只有法式革命的道路，才能拯救：

夫我既受數千年之積痼，一切事物，無大無小，無上無下，而無不與時勢相反，於此而欲易其不適者以底於適，非從根柢處掀而翻之，廓清而辭辟之，嗚呼可哉！嗚呼可哉！此所以 Revolution 之事業為今日救中國之獨一無二之法門^⑱。

也在這篇〈釋革〉中，他指出“吾中國前此所謂革命者”，名不副實，冒用了“此文明崇貴高尚之美名也”^⑲。

但梁啟超自己也無法做到不用“革命”這個詞。1904年他在《新民叢

^⑯ 亞盧，〈中國革命家第一人陳涉傳緒論〉，《江蘇》9-10合本。

^⑰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釋革〉，《新民叢報》22（1902），1。

^⑱ 中國之新民，〈釋革〉，3-4。

^⑲ 中國之新民，〈釋革〉，4-6。

報》上又發表了〈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其中詳細區分了革命的“廣義”和“狹義”：

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者皆是也。
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武力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⑬。

梁啟超這番分析中西革命異同，如陳建華所說：“由於廣義的革命的引入與接受，世界革命成為中國革命的尺規和資源，中國也就不可逆轉地進入世界革命洪流。同時中國傳統的革命理論獲得‘狹義’上的承認。”^⑭

柳亞子是否看到過這篇文章，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是這兩篇文章確實構成了很強的互文性。在柳亞子這裏，從他對於西歐革命的毫無保留的稱頌和對中國歷史上“鼎革”事件的批評上，可以看出他也接受了革命的世界性與現代性的內涵，所以他亟亟於區分“革命”與一般的暴力破壞的差異。但有意思的是，他同時也沒有放棄在中國歷史傳統中尋找“革命”的努力。於是，“得一推倒政府，普救國民，留絕大紀念於吾祖國之大英雄、大豪傑焉，曰：陳涉。”^⑮他把陳勝作為中國“革命家”之第一人，就意味著同時賦予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以“革命”的合法性。這就在不自覺中又放棄了他前面對於“革命”現代性意義的執著。以所謂“推倒政府，普救國民”來作為衡量“革命”的標準，所指相對模糊，這就解散了革命與民主政治之間的“接合”（articulation）。同時，以中國人熟悉的農民“造反”作為中國“革命”的淵源，使得“革命”對普通民眾而言的誘惑力大大增強，他們感到自己才是“革命”的主體。這一番對“革命”的推銷，最終訴諸對群體的暴力迷狂的鼓動。

柳亞子還把“革命”跟古代打抱不平的遊俠之風聯繫起來。1906年他在〈燕獄〉一文中，針對清政府捕殺革命黨事，說：“今燕京所捕殺之革命黨，雖不知其為燕之土著，抑他省人僑居於燕者，要之以京師輦轂之下而能

^⑬ 中國之新民，〈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叢報》46-48合刊（1904），115。

^⑭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53。

^⑮ 亞盧，〈中國革命家第一人陳涉傳緒論〉，《江蘇》9-10合本。

抱不軌之志，著運動之跡，其智略能力必有大過人者。事雖敗露，亦不可謂非民族之晉化也。燕市之月，易水之風，願後死者勉之而已。”^⑩著眼的是“革命黨”在民族意識和行事風格上對於俠義傳統的繼承。如此泛泛地談論革命浪潮，就像馬君武在〈去國辭〉中寫下的：“黑龍王氣黯然銷，莽莽神州革命潮。甘以清流蒙黨禍，恥於亡國作文豪。”^⑪起碼在語言上，他們依然沒有廢棄“清流”“黨禍”這樣的傳統典故。“革命”主要意味著直接的反叛行動。不過，到了1907年，徐錫麟、秋瑾發動皖浙起義，被清政府殺害時，柳亞子作詩哀悼，直接稱他們的行動為“革命”：“黃金意氣鐵肝腸，革命運中最擅場。”^⑫這說明光復會、同盟會等團體領導的暴力推翻清政府的活動，已經被認為是“革命”的典範了。

四

在高旭那裏，“革命”這個詞同樣頻繁出現。1903年他在《題〈女學報〉四絕》的第四首中，使用了“革命軍”這個詞：“龍旗繚繞爛如焚，女界長驅革命軍。”^⑬這時，正是“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著《革命軍》在上海印行之際，顯示出高旭對於革命話題的追得很緊。他讀《法蘭西革命史》後，作〈讀《法蘭西革命史》，作革命歌〉，詩中歌詠法國大革命：“腦兵剷除巴士的，自由權利悉奪回。再誅獨夫卻普奧，萬眾一聲歡如雷。”看重的是民眾奪回自由權利，廢除君主專制的“革命”成果。但高旭同時也指出，儘管人民志氣昂揚，但“革命”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卻不容忽視：“踏湯赴火購太平，擲萬頭顱流萬血。”“革命”是以成千上萬的生命的流血犧牲來成就的，這讓他面對是否要提倡革命有些猶疑：“我欲不革命，民氣日折

^⑩ 柳亞子，〈燕獄〉，《磨劍室文錄》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65。

^⑪ 馬君武，〈去國辭〉，收莫世祥編，《馬君武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91），405。莫編系年為“約1903”，有誤。從胡曉明《近代上海詩歌系年初編（1898-191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改。

^⑫ 柳亞子，〈吊鑾湖秋女士〉，收柳無非、柳無垢選輯，《柳亞子詩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12。

^⑬ 劍公（高旭），《題〈女學報〉四絕》，收郭長海、金菊貞編：《高旭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342。

磨；我欲說革命，忍看血成河。”^⑩

高旭顯然接受了西方以法國大革命為標準對“革命”所作的現代界定，即重視革命的民主訴求。不過，他也深刻地意識到了革命與暴力的內在關聯，並對此不無憂心。在他看來，最大的問題還出在“獨夫”身上，是“獨夫”的堅持專制造成了革命的不可避免。在大致同時也刊於《國民日日報》上的另一首詩中，他還是呼喚掃蕩君權的“大風潮”的來臨：“君權無上虎狼驕，喝起人群熱血燒。冷落神州竟至此，何人為演大風潮。”^⑪以法國大革命為榜樣的民主革命，始終讓高旭心儀。1906年某天他夜遊留園，感慨賦詩：“電燈無數影霏微，隱幾妄言夢欲飛。歷歷斷頭臺上景，好風吹到法蘭西。”^⑫詩題中特地點明，原來“是日乃法國大革命紀念日也”。“歷歷斷頭臺上景”本直接代表了革命的恐怖和暴力，但在高旭心中，似乎成為了值得神往的風景。

但就如柳亞子等人一樣，高旭筆下的“革命”的內涵界定也不那麼一致。1906年他在為柳亞子所著《中國滅亡小史》題詞時，記述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說道：“地方革命難，當自中央革。林清事不成，烹之大可惜。提刀破偽宮，移檄暴凶德。”^⑬所涉及史事，為1813年在河北傳天理教的林清（1770—1813），派教徒暗藏武器，化裝潛入北京，在農曆九月十五日那天，九十多人在宮內信教的太監接應下，攻入皇宮，在隆宗門外與宮內護軍激戰，終因人力單薄而失敗。高旭把太平天國和林清進攻皇宮事都說成是“革命”，顯然他使用的還是改朝換代的傳統意涵。但這裏關於首先從北京發起的“中央革命”的設想，確實是當時很多革命黨人設想的方案。

五

無論是警惕革命的梁啟超，還是呼喚革命的陳去病、柳亞子和高旭，他

^⑩ 秦風（高旭），《讀〈法蘭西革命史〉，作革命歌》，原刊《國民日日報》1903年10月，收《高旭集》，344。《法蘭西革命史》和《黃帝魂》等一起，曾被健行公學作為教材。

^⑪ 天梅（高旭），《讀〈俄羅斯大風潮〉》，《國民日日報》，1903年10月13日。

^⑫ 天梅，〈夜遊留園，是日乃法國大革命紀念日也〉，《復報》第六期，1906年11月11日。

^⑬ 帝劍（高旭），〈中國滅亡小史題辭〉，《復報》3（1906）。《中國滅亡小史》雖然寫作於1903年下半年，但至1906年才在《復報》上連載。而高旭讀到此書，當是1906年在健行公學與柳同事期間。

們在“革命”的意義理解上都體現出某種混融，以及受制於語言的牢籠的現象，這大概也證明傳統“革命”影響遺存已經成為了一種集體無意識，難以滌除。儘管他們試圖對“革命”作出清晰的界定，但“革命”話語本身呼應著騷動的時代浪潮，已經將暴力的正當性推至了極端，具體的制度選擇倒成為不遑細思的了^④。“革命”成為了拉康意義上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一個虛擬的象徵序列，主體被符號結構控制著“說話”。正是通過符號化，各種前語言的存在才變成了“秩序”——雖然在世紀初的中國，這種“秩序”本身意味著打散既有秩序。

（張春田 香港 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

^④ 比如，在壯游（金天翮）的〈國民新靈魂〉裏，“共和主義、革命主義、流血主義、暗殺主義”並列在一起出現。它們之間的分別似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呼喚“軍人魂”和“以鐵血為主義”。《江蘇》5 (1903)。